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005-9245, CN 65-1039/G4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历史演化与展望
作者: 朱华雄, 周文蕾, 阳甜
DOI: 10.14100/j.cnki.65-1039/g4.20201215.001
收稿日期: 2020-11-20
网络首发日期: 2020-12-17
引用格式: 朱华雄, 周文蕾, 阳甜.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历史演化与展望[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01215.001>



网络首发: 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 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 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 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 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 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 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 录用定稿一经发布, 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 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 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 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 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演化与展望

朱华雄 周文蕾 阳 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0)

摘 要: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1987 年我国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 确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2020 年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确立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发展战略。两次国内、国外“大循环”战略的指导思想、内涵理念、战略地位显著不同, 文本对其进行分析、比较、评价, 以概述“双循环”理论发展的内在演化逻辑, 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今国内外发展新形势, 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双循环”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国际大循环; 内需

中图分类号: F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 (2021) 05-0000-14

2020 年,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并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和制定第二个百年发展战略的迫切需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双循环”战略, 不仅是对 1987 年“国际大循环”这一外向型经济战略的调整, 而且是基于国际形势、国内社会主要矛盾, 以及国内、国外“大循环”发展战略主次地位等变化的宏观调整。因此, 为了更好地认识“双循环”新发展理念, 并将其具体化和对策化, 有必要厘清这一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历史逻辑, 总结过去“国际大循环”和“国内大循环”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 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双循环”的实施路径。

一、“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历史演化

(一) “国际大循环”战略发展理念的提出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由于 1978 年年底我国的物资、信贷、财政和外汇收支均出现较大的不平衡, 给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困难^[1]。1979 年, 全国开始纠正前期“洋跃进”的错误^①, 并对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不协调的问题进行“大调整”, 为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奠定现实基础。与此同时, 1979 年 4 月, 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同志建议在深圳、珠海以及汕头, 各划出一块地方, 单独进行管理, 使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邓小平同志对此表示支持并提议将这些地方的名称定为“特区”^[2]。1980-1988 年, 我国先后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自

收稿日期: 2020-11-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6BJL01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2018-1-03-4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朱华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作者: 周文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阳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1978 年 2 月, 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批准, 我国大批量引进一系列高水平国外设备, 计划在短时间“买回来”一个现代化。仅 1978 年一年, 就签订了 22 个大型引进项目合同, 共计 78 亿美元, 全部用现汇支付, 加上国内为配套工程的投资, 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历史上称此次对外引进为“洋跃进”。

此,党中央开始酝酿特区和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决定迈开大步走“外向”之路。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和沿海地区时发现,有的特区致力于成为商贸中心、金融中心,而对以工业、出口为主的发展方针贯彻不力。作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和“开放的基地”的特区,存在基建铺得过大、非生产性项目多、产品出口增长慢、外汇支出大于收入等问题。邓小平同志对此指出:“我国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刚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健康的。不过,听说这方面有了一点进步。”^[3]同时,我国还存在生产力发展和下一阶段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即工业结构高级化(资金密集型基础工业、基础设施、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争夺资金的矛盾^①。由于我国工农业之间比较利益悬殊较大,致使大量资金转向投入非农产业,从而造成农业上不去,工业萎缩的局面^[4]。亟待探索与对外开放相匹配的经济发展战略,以解决我国农业发展徘徊不前、城市改革总目标明确但具体目标摇摆不定的困境。

在此期间,国际分工与交换正飞速发展。一方面,英国、美国、日本、部分拉美国家、中东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因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实现了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波动冲击和美国贸易压迫造成西方股市大幅下跌,美元贬值,日元被迫升值,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国家均加速产业结构转型——由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从而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自发地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

在此背景下,我国决定抓住机遇、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利用国际贸易、产业、投资结构的调整时期,加速融入世界分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5]。1987年,时任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健发表《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一文,他认为,发展“国际大循环”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和重工业相对发达的优势。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我国沿海地区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汇支援工业和基础建

设,继而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以重工业的发展支援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既可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可以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为重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6]。“国际大循环”的构思引起中央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并于1987年11月—1988年1月前往浙江省、江苏省、广州市等地进行多次专题调研后,提交《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报告。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国际大循环”战略,并将其定为1988年要着力抓好的一件大事^[7]。1988年3月,国务院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上,正式决定对沿海地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等地,进一步推动了长江沿岸港口工业城市和内地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及沿内陆边境若干城镇的开放,使全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3]。

(二)“国际大循环”战略的理论探索

虽然我国确定了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改革发展目标,但鉴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例如,1987年我国出口贸易总值为395亿美元,这些出口商品大部分都要先经过国内市场的流通渠道,再投放到国际市场;同时,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原材料、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也要先经国内市场流通而按需结合起来^[8]。因此,该目标的提出与实现,均应建立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之上。那么,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循环”二者之间的关系?

外向型经济易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旦外部环境变化,原料成本上涨,我国就可能陷入“易进难出”的困境。为提高抵御这种市场风险的能力,有学者指出,我国在“强调‘外循环’的同时,应兼顾一定比例的‘进口替代’和国内市场,即‘内循环’”^[9]。例如,季崇威表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国际循环应建立在渠道畅通的国内循环基础上。为了沟通沿海与内地间的协调分工关系,发展外向型龙头集团是值得提倡的组织措施”^[10],同时,为了缓解国际大循环面临的困难,可以增加国内大循环和农产品小循环。四川

① 1978年,我国产业结构(物质生产部门中工业占比)已呈现出人均GDP为1000美元以上的国家特征,而劳动力结构(农业劳动占劳动力比重)却表现为人均GDP在100美元以下的国家特征。参见陈少斐:《国际大循环纵横谈》,《广东金融》,1988年第6期。

省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大循环”，“首先要以参加国内的经济大循环为主，进而全面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拳头产品’”^[11]。

此外，部分学者对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提出建议。例如，祝留认为，小国因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短缺会选择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我国是一个大国，在既定的产业结构中，对外出口规模客观存在数量界限，跃过这个界限，原有比较利益丧失，换汇成本外流，因而可能会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15]。陈少斐表示“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不是资金不足，而是资源不足。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应着眼于增加外汇储备，解决生产资料稀缺问题”^[9]。

从理论上讲，我国提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仅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而且符合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发展趋势。第一，世界经济实践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参与国际大循环，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突破国家界限，扩大至世界范围。第二，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列宁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11]，市场是商品生产者实现其商品价值的场所，没有市场，商品生产者便无法生存，市场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商品生产者为了实现商品价值，不仅需要国内市场，还需要国外市场。因此，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第三，沿海地区采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符合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90年代，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费用较低、素质高于东南亚地区的丰富劳动力。通过动态比较利益的原则调整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利于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发展对外技术交流合作，增强竞争意识，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实践探索

“国际大循环”战略是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的探索阶段提出，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所有制结构、改变用工制度等方面陆续展开。为增强企业活力，各地区均结合自身发展优势，选择不同模式发展外向型经济。例如，东北地区选择适当

的形式参与“国际大循环”，其中，黑龙江省提出“以提高省内自循环能力为核心，双向开放，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并举，一头向外的经济发展战略”^[13]，即“内循环和外循环交叉式”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地理和政策优势，以“三来一补”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通过“三资企业”，从工业、农业、旅游业、劳务输出等多元化途径参与国际大循环，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引进内地原材料或引入内地龙头企业到沿海“落户”。中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农作物、畜产品等生产较为集中，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表示也要加强与沿海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其中，河南省既致力于成为沿海地区原材料的“后方”，同时又拟利用京广、陇海铁路十字交叉地带构建“内陆双向大循环经济开放试验区”，鼓励农村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加入两个大循环发展战略中^[14]；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利用靠近闽粤的地理交通优势，以流通为突破口，“牵两头，活中间”，带动整体经济参与国内、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15]。西部地区由于区内市场狭小、需求弹性不足、科技不足等劣势，大多选择以国内大循环、区内循环为主，间接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方式。其中，四川省提出，要利用其特色产品（如丝绸、皮革、麻类、茶叶、中药材和机电等），调动国防工业在内的科技力量，提高产品加工深度和质量，以增加出口品种和数量，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16]。

在党中央的倡导下，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积极加入“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从实际发展看（见图1），东部地区省份的外贸依存度迅速上升，在吸引外资和出口创汇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0–2018年，东部地区贸易总额由4177亿美元增至37779亿美元。东北部地区的对外贸易略有进展，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则始终维持在6%–15%的水平。但也不难看出，因“国际大循环”战略引致资金、劳动力等资源长期集中于出口导向部门，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创汇和外商直接投资，反而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并使国内消费动力长期受到抑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单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开始显露。为应对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我国先后提出“四万亿”财政投资计划，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扩展消费的新增长点等政策，其结果是消费增加不明显，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扩大。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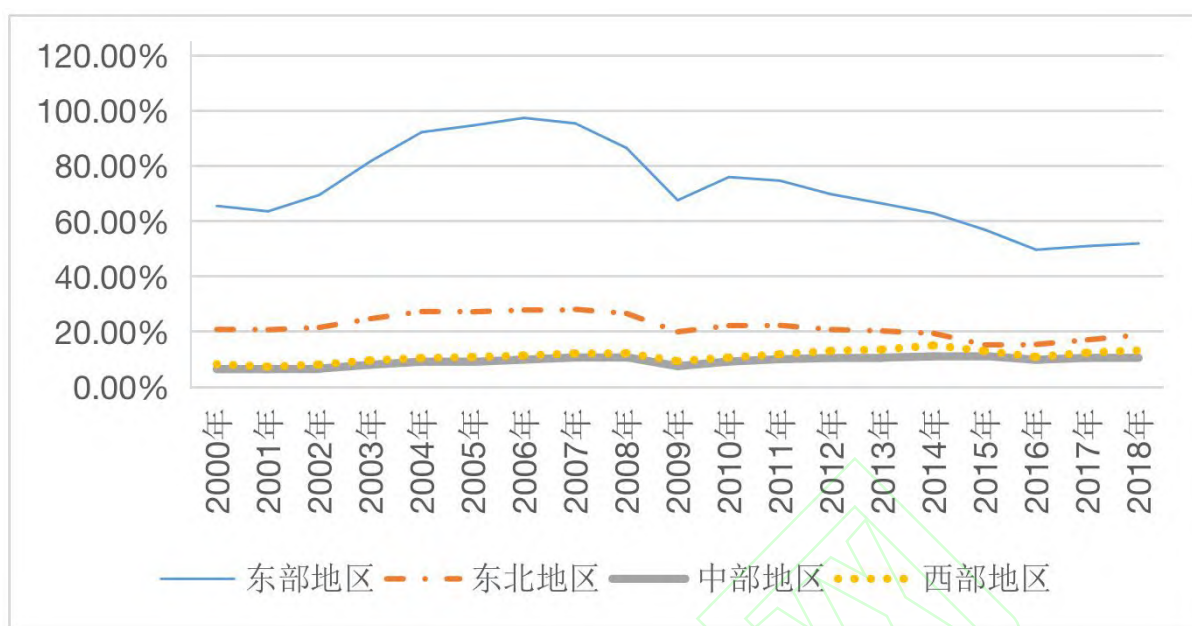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18年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趋势图

数据来源：根据2000-2018年全国各省统计年鉴整理。

展初级阶段的一些次要矛盾和潜在矛盾正逐渐凸显，例如，扩大内需难、产业升级难、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等，经济长期发展战略亟待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整。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选择及其理念

（一）国际局势新变化

2016年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开始蔓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预测，受贸易紧张局势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2019年，世界商品贸易额下降0.1%；世界商品出口按美元计算下降3%^[17]。据2020年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和汇丰银行（HSBC）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19年开始实施并在当前仍然有效的贸易进口限制措施对20国集团（G20）约10.3%的进口量（约1.6万亿美元）产生影响；除非政府取消或降低关税，否则全球GDP将在2025年损失高达10万亿美元^[18]。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摩擦中，2018年3月，美国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的钢铁、铝等产品加收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拉开序幕。此后，美国相继对中国340亿、160亿、2000亿出口商品加收关税，中方提出反制措施，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见表1）。例如，中国和美国都提高了彼此

的出口关税。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21%（2017年平均值为3.1%），未来可能进一步提高到26.6%；2018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下降约7%，2019年第一季度下降更多（约19%）。尽管2018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由于前压（预计之后的关税上调）仍增长了7%，但在2019年第一季度下降了约13%^[19]。

此外，暴发于2020年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见表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在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世界经济将萎缩4.4%，中国可能成为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其中，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萎缩9.2%，几乎所有地区的贸易额都将面临两位数的降幅，全球贸易总量跌幅有可能超过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贸易下滑幅度。

（二）国内发展新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实行“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如矿产资源）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对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此后，在全球货物进出口贸易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见图2），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

表1 2018–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

产品种类	洗衣机、太阳能电池板	钢铁、铝	340亿产品	160亿产品	2000亿产品
适用条例	条款201	条款232	条款301	条款301	条款301
	国内产业进口救济	国家安全	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
生效时间	2018-02-07	2018-02-23	2018-07-06	2018-08-23	2019-09-23
范围	使用普惠制的发展中国家	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 韩国、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数据来源：根据中美贸易摩擦时间顺序整理。

表2 世界各地区进出口贸易及GDP增长率（%）预测

		历史数据		乐观估计		保守估计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0	2021
国际贸易总量		2.9	-0.1	-12.9	21.3	-31.9	24.0
出口	北美地区	3.8	1.0	-17.1	23.7	-40.9	19.3
	中南美地区	0.1	-2.2	-12.9	18.6	-31.3	14.3
	欧洲	2.0	0.1	-12.2	20.5	-32.8	22.7
	亚洲	3.7	0.9	-13.5	24.9	-36.2	36.1
	其他地区	0.7	-2.9	-8.0	8.6	-8.0	9.3
进口	北美地区	5.2	-0.4	-14.5	27.3	-33.8	29.5
	中南美地区	5.3	-2.1	-22.2	23.2	-43.8	19.5
	欧洲	1.5	0.5	-10.3	19.9	-28.9	24.5
	亚洲	4.9	-0.6	-11.8	23.1	-31.5	25.1
	其他地区	0.3	1.5	-10.0	13.6	-22.6	18.0
GDP	实际GDP增长率	2.9	2.3	-2.5	7.4	-8.8	5.9
	北美地区	2.8	2.2	-3.3	7.2	-9.0	5.1
	中南美地区	0.6	0.1	-4.3	6.5	-11.0	4.8
	欧洲	2.1	1.3	-3.5	6.6	-10.8	5.4
	亚洲	4.2	3.9	-0.7	8.7	-7.1	7.4
	其他地区	2.1	1.7	-1.5	6.0	-6.7	5.2

数据来源：Azevêdo D G. Trade set to plunge as Covid-19 pandemic upends global economy, WTO Trade Forecast Press Conference, 2020: 9.



图2 1987–2019年中国同美国海关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1987–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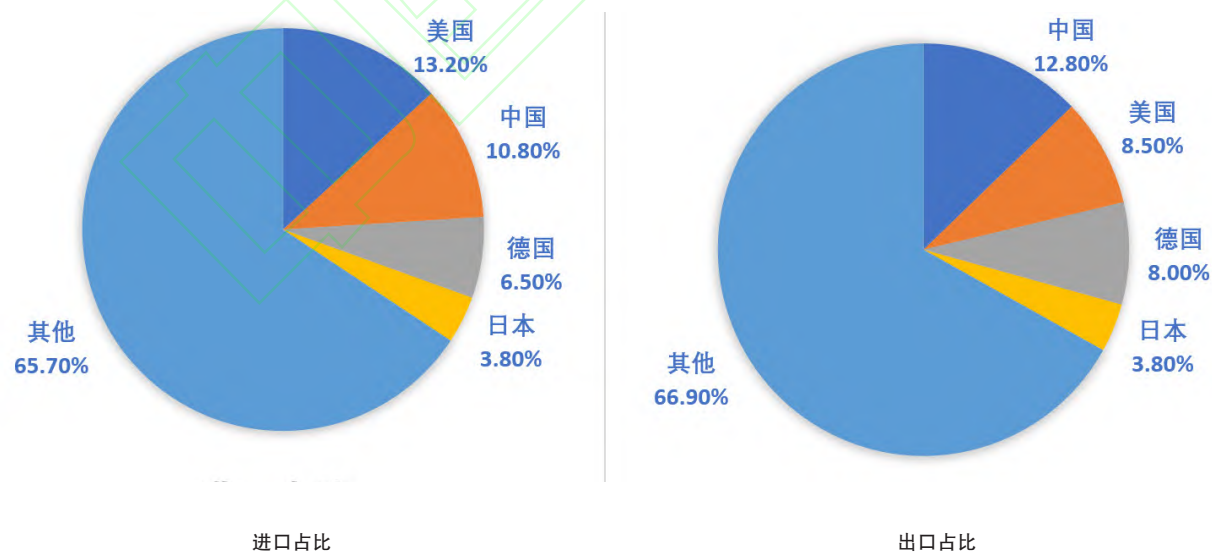


图3 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地区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

望》显示,2018年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9.342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2.8%,高出第二名美国8230亿美元,分别是第三名(德国)、第四名(日本)出口额的1.56倍和3.24倍;中国贡献了2018年世界总进口数量的10.8%,仅低于第一名美国(13.2%),领先德国(6.5%)和日本(3.8%)(见图3)。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1.03万美元),缩小了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这也意味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和社会财富得到了稳步提升。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从2010年的10.4%下降至2019年的6.1%,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由此进入新常态。尽管2015年国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社会生产水平,以提高供给结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但是中国“内循环”仍面临诸多堵点。

1.R&D结构不合理和科研人员密度低

尽管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投入力度持续稳步增大,并于2015年开始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但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的比值)与美国、日本等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例如,2018年,中国在R&D经费投入强度为2.19%,低于美国(2.79%)和日本(3.21%)^[21]。与之相应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也较低,例如,我国国防科研成果转化率仅约1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60%^[22]。同时,当前中国的科研活动以试验发展为主导,产品价值链高端的研发与设计环节相对应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入相对较少。又如,2018年,中国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5.5%、11.1%和83.3%;而2017年,美国此三项活动分别占美国整个R&D活动的16.9%、19.7%和63.4%^①,这意味着,美国R&D发展结构相较中国更为合理。2018年,英国每百万人中约有4603位科研人员;最高的丹麦达到8066人/百万人,日本也达到5331人/百万人;而在中国每百万人中仅有1307位科研

人员^②。由此可见,我国距离实现“科技自强自立”的目标和成为科技强国仍有较远的距离。

2.国内居民有效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攀升,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已由2013年的47.0%上升至2018年的76.2%;2013–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0.5%^[23],但仍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80%–90%的平均贡献率水平。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已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国内市场转向海外购物,导致部分消费外流。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海外代购市场交易数额不断增长,截至2018年已达到2601亿元;2019年中国海淘用户超1.5亿人,预计该数字将于2020年进一步增至2.32亿人^[24]。中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是全球最具规模的消费市场,因而,国内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

3.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矛盾仍较明显

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如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万元,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64倍(1.60万元)。同时,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2019年,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1.59%、22.08%、20.71%。但是,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快,2018年、2019年,全国老年抚养比分别为16.77%、19.6%。从不同地区看,2018年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如广东、海南分别为11.04%、11.3%,远低于全国水平;而西部的部分地区则“老”得更快,如重庆、四川老年抚养比分别为21.09%、21.83%。可以说,当前中国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仍较突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等区域仍有待深化改革,中国未来解决内部矛盾的压力仍较大。

因此,继续参照过去“亚洲四小龙”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将会收效甚微。为破局开路、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创造新增长点与增长极,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深刻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全面创新。

①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② 2017年,美国每百万人中,大约有4412位科研人员工作者。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三) “双循环”战略的发展理念

2020年是完成“十三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基于国际局势新变化、国内发展新形势以及国内现实发展需要,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推动“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25]。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以内需潜力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促进这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更好利用,从而实现更加强劲的可持续发展^[26]。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当前国内条件和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7]。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表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它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未来我国将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28]。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29],逐步完成20世纪80年代“国际大循环”到21世纪20年代初期“双循环”新发展理念的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共中央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富有前瞻性、全局性、基础性、针对性的重大战略。该战略部署不仅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举

措,更是对过去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继承和创新。

1. 20余年扩大内需的政策使消费地位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深刻认识到内需不足对国家发展的影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将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①。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贸易受到影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200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消费需求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消费的地位自此发生质变^②,消费在规模、水平、结构方面逐渐升级发展。报告强调“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从党和国家关于扩大内需的20余年政策沿革可以看到,消费地位经历迂回上升并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坚持扩大内需最终成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

2. 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步构建起国内市场的内循环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实现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早做谋划、科学研判,并于2012年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就已酝酿以经济结构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加快经济转变的发展方式^[30]。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

① 1998年后,国家推进一系列消费信贷、消费调整宏观措施,例如,家电下乡,实现短期拉动消费。1999年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强调了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终点和起点的重要地位,同时强调发挥消费和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2006年,“十一五”规划提出合理调整居民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在提高消费需求,经济增长要靠“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实现。

② 2014年,在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到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消费地位从“主导”转为“基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延续前期思路,变化不大。2018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肯定了消费在规模、水平、结构方面取得的成绩,但也认识到当前依旧存在制约消费的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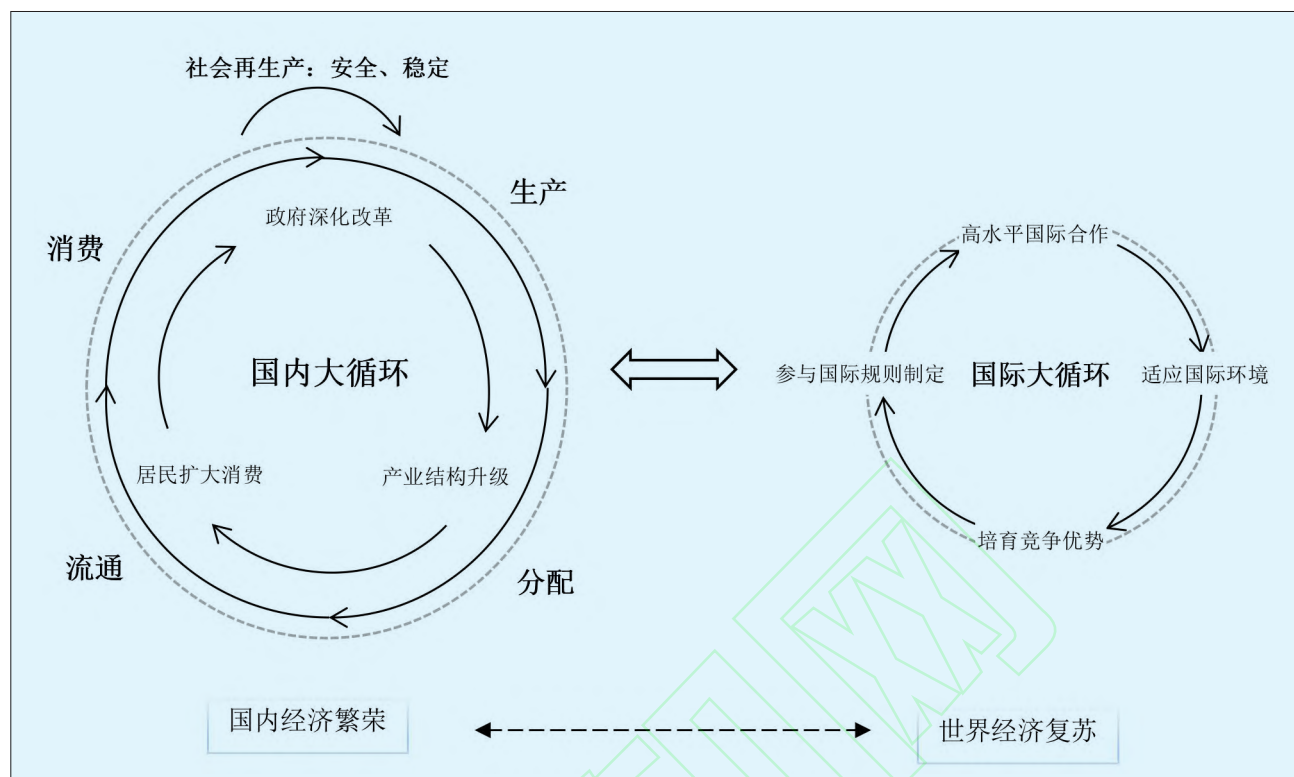


图4 “双循环”发展的涵义

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在党和国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5年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矛盾的有效良策，我国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不动摇^①，实现无效产能加速退出、产业结构明显改善、资源误配得到纠正，内生动力不断积聚的发展路径。

202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因此，“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审时度势，适应三次国际经济大冲击（1998年、2008年、2020年）后系统谋划的一部分。自1998年起，我国开始通过以需求侧的渐进式改革调整外

循环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2008年以后，需求侧改革持续发力，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时实现突破，但同时面临有效供给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的问题。2015年，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国家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打破对旧有模式路径依赖的阻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制性地推进经济结构转变和产业升级。战略上，坚持从持久战的角度出发，酝酿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最终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通过20余年扩大内需和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步形成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双循环”战略是中国经济变革的内在规律性要求，是党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由此可见，新格局下“双循环”内涵的实质（见图4）是改变外向型经济主导的发展格局，由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增长型^[31]。以“国内大循环”

^①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在重庆、青海调研时均提到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在2017年、2018年、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仍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为主,把满足国内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当下,必须改变过去长期依赖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思想,集中力量解决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与高质量发展不匹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核心技术缺失、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较慢等问题。以期在稳定、畅通、提升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促进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提高我国参与全球化的价值,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调发展。

三、“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有效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确保“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有效推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畅通:国内大循环

1. 持久拉动内需

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必由之路。第一,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体的收入,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增收方面,完善农资产品价格稳定机制,确保农产品产销两旺;增强农民务工务农技能;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加大财政补贴投入,以补偿农民因自然灾害等遭受的利益损失。在降本方面,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降低其在医疗、医保、医药等“三医”方面的费用,减少“因病致穷”、“因病返贫”现象的出现。第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增加居民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和劳动报酬占比;另一方面,完善收入再分配比例,缩小收入不合理分配、城乡分配以及层级(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分配的差距。

提升消费环境,开拓消费渠道。“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拉动力,消费已经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32]为持续扩大消费需求,有效刺激消费潜力,应拓宽多样消费领域,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弘扬积极的消费文化等,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第一,从供需两个层面发展与建设新兴消费领域(如“老龄化”消费)和消费工程(如信息消费、消费金融),从而实现消费升级。第二,加强消费品的安全立法监督,严惩“黑心”产品、“宰客”、泄露或贩卖个人信息等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第三,开拓农村消费渠道。针对农村消费的堵点,充分发挥当前电商、物流网络等

发展优势,加快提升农村农产品流通的现代化水平,特别是要将电子商业服务体系及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向乡(镇)、村延伸拓展,在推动农村农产品消费的同时,打通城乡经济交流和要素流动通道。

2. 推动科技创新

营造公平的竞争创新环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第一,政府应以政策形式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释放企业创新能量,通过加大财政政策支持、优化服务、完善专利保护制度和集体发明制度,提高创新效率,形成“追求超越、敢于超越”的良好氛围。第二,调整 R&D 类型之间的结构,加强研发合作。我国应深度融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部门之间的合作,大幅度提升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强对前沿科技发展的谋划与统筹,以寻求具有转型意义的基础研究带动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的快速上升,形成创新活力新动能。

注重对科研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提高科研人员密度。人才是第一资源,虽然我国于 21 世纪初期已步入老年国家行列,人口红利逐步趋弱,但人口质量的提升,即人才红利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的新红利。第一,研究型大学应按照工业发展的方向,灵活改变授课内容并增加新兴领域的学位设置。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等科教重镇,汇聚了中国大量一流的高校教育资源,具有广阔的人力资本发展空间,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第二,应大力推进创新型科技人才发现、培养与激励机制,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发展瓶颈,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科研队伍,逐步形成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的局面。第三,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外资企业等用人单位应推出优惠措施吸引高科技人才来华就业。设置更清晰的外国科技人才来华就业、定居、入籍的政策,并鼓励中国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发展,为我国实现科技人才梯队建设构筑坚实基础。

3. 完善数字经济发展制度

近年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 5G 等技术得到较快发展,当下,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动力,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资源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价值。2020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围,要求加快培育

数据要素市场^[33]。

完善数字经济相关配套支撑，确保数字经济的合规发展。第一，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由于数据资源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等特征，需要完善数据流通与交易机制，特别是要有效发挥大数据交易所、数据公司等数据市场中介机构的作用。2016—2019年，我国移动网络支付用户规模由4.75亿人上升至6.33亿人；移动社交用户规模由6.65亿人增至7.77亿人；个人云盘市场规模更是由1.2亿元扩大到8.6亿元^[34]。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虚拟货币、移动支付等数字经济发展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数据产权界定、配置模式、定价方法等方面都需要深入研究。第二，为确保数字安全，国家有关部门、网络平台应出台配套措施，强化对相关信息、财产权益等的保护。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均将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纳入制度和立法保护范畴，对新时代数字安全的保护具有价值引领作用。未来我国仍应加大对相关保护措施的探索，出台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和监管政策，确保在发挥数字资源潜能的同时，推动数字要素资源的合规发展。

增加数字经济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部门等产业的研究与运用。据《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增长迅速，市场规模于2017年达到237亿元，但其研究领域较为分散，应用主要偏向于与生活服务业相联系的视觉（34.9%）、语音（24.8%）方面；相比国外，中国企业更看重终端产品（如无人机、智能机器人、智能驾驶）的市场规模（仅为10%）^[35]，未来可以加大对硬件、算法等核心领域的研究，促进人工智能等对中国经济增长更具有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部门的融合^[36]，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的“质”与“量”。

4. 拓展公共和私人投资空间，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发挥政府公共投资的杠杆撬动作用。政府公共投资具有投资的基本属性，当其作为流动变量纳入巴罗（Barro）改进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显示出较强的正外部性，影响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37]。第一，新发展格局下的政府公共投资要更加注意质量和效益，着眼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基

础设施、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强基础、增功能的重大项目建设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第二，市场机制下不同区域存在要素禀赋的差异，具有不同的投资收益率。政府应加大对新型城镇化、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投资，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地区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实现西部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通，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有利于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一，支持民间资本创新发展，增强市场适应力和竞争力。按照“政府主导、专业管理、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引导民营资本投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畅通融资渠道，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的作用，加强投资信息平台建设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国家产业政策、发展建设规划。创新和灵活使用多种金融工具，不断完善民间投资的融资担保制度、健全创业投资机制，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第三，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财政、融资、结构调整、经营管理水平、公共服务的支持，具体包括：继续减免部分涉企收费并清理取消不合规收费、建立企业集聚发展基地（微型企业孵化园、科技孵化园、商贸企业集聚地）、引导企业进入教育、社会福利、科技、文化、体育、商贸流通等领域，进一步加大产权保护力度。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投资活动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只有加快构建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和投资自我约束机制，才能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保障。第一，进一步下放核准权限，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简政放权，按照“转变职能、下放权力、明确责任、强化管理”的原则继续鼓励和扩大社会投资。完善本地企业、外商、境外投资的核准制、备案制、管理法规体系，加快新兴产业的政策和行业准备标准制定，投资管理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第二，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明确政府投资范围，实现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领作用。政府投资方向和范围应限制在公共领域，例如，公益性项目、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支持边疆地区发展等。政府投

投资项目要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经营和管理,规范投资招标、专家评估审议制度和错案追究制度,强化全过程监督、促进投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第三,完善和健全投资调控体系,构建投资管理长效机制。尽快建立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化、中介服务规范化、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进一步改变政府投资管理、健全投资监管、规范投资活动。

5. 统筹国内经济空间布局,通过兼并重组发展价值链高端产业

以西部大开发为中心,推动多样化分工在空间上向纵深发展。将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不仅有助于改变我国高端产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而且有助于国内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的纵深发展。第一,在资源富集的西部地区布局一批资源深加工和应用产业。我国自然资源大部分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就地工业化不仅能够降低高昂的资源运输成本,而且资源加工带来的联系效应可以带动当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就业和财政问题。第二,通过产业集群效应的发挥,不断进行产业升级,缩小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差距,破除“资源诅咒”,使城市化和国民经济空间布局逐渐合理化。第三,将稀土等现有本地优势资源密集地使用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在国家的扶持下为科技革命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保障。未来世界范围可能爆发以新能源、新材料、纳米、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六次科技革命,开发和扶持技术革命的必需品生物、稀土等自然资源在我国新技术主导产业下的运用,有助于创造赶超发达国家的窗口。

推动企业兼并整合并改革商业流通体制。企业是市场开发的主体,美国19世纪以内需主导型工业化的崛起表明强大的工商业是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根本经济力量^[38]。第一,支持中小实体企业做大做强、兼并重组。有针对性地组建大规模企业联合体,促进产业链前后整合,兼具初级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鼓励和推动现有企业联合攻关,鼓励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通过市场机制打造大型企业集团和产业链,克服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进入壁垒。第二,深化商业流通体制。一方面通过完善反垄断法律明确界定和规制大型零售商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另一方面利用税收杠杆等工具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降低企业的营销成本。通过发展综合型企业,打造由本国企业控制的高端环节和流通渠道的

国家产业链,改变跨国企业垄断我国商业流通体系的现状,从根本上使民族企业掌握渠道控制权和价格制定权,并大幅降低商业流通费用。

(二) 贯通: 国外大循环

1.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原则,打造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第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进一步考察沿海地区并考虑增加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深圳经济特区历来凸显“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的特色,始终保有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开拓进取的历史传统。此次,党中央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表明党中央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其他地区如果具备扩大改革的成熟条件,例如,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区的一些城市,国家也可以考虑将其列为先行示范区,进而加快其改革步伐,加大其改革力度。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格局下,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融合创新链产业链发展机制、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和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等问题亟待解决。以上问题的解决措施将由先行示范区的大中小实体企业在实践中产生、检验、试错、修正、再试验,逐渐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

2. “一带一路”引领区域经济多边合作

第一,全球化逆流导致产业链供应链急需补链、强链,但国内循环并不要求一国构建全产业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可以协商合作创建一批示范性国际循环项目,形成合理分工、供应链互补的良性循环。第二,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制造品、劳动力、市场技术等生产要素实现互利共赢。目前,我国已累计与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应坚持将我国优势产业资源,如钢铁、电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资本品以及家电、电子产品输送到沿线国家有需求的领域,如此,既能有效解决我国产能过剩造成的囤积问题,又能以劳务派遣方式缓解部分

劳动力的就业难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在中东石油国家的经济建设时期，韩国向其提供大量劳务出口，获得巨额外贸收入并为自身产业升级转型奠定了基础。第三，加强区域性多边合作，团结中东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应对发达国家的孤立主义、霸权主义。

3. 经营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当前全球治理“非中性”规则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并主导，不仅不能体现国际关系的公平和正义且落后于当代经济的发展。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中，非西方国家的话语权明显低于西方国家。在1952年签订全球通用的国际海关规则后，至今尚未进行较为明显的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70余年的经济外交和40余年的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完成由全球化“参与者”到“引领者”身份的转变。因此，我国应从熟悉国际规则转向参与制订国际规则或者修订双边、多边规则。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4. 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协调高质量发展

在开放型经济中，不同类型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技术水平、管理经验、研发能力、投资目的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第一，引进技术能力强、管理能力强、盈利能力强的FDI。技术创新的外溢性有助于国内企业模仿学习，增强自身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系统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能促进国内资本要素的合理分配。第二，逐步取消出口退税，严格限制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FDI。过去十几年间，FDI的挤出效应和超国民待遇的政策造成中国经济始终难以摆脱外延式增长的困境^[39]。目前，我国产业结构面临“高端失守，低端混战”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因此，在核心技术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必须保证国家自主研发掌握。第三，推动OFDI的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力支持高端产品的出口，将优势产能转移到目的国，提升我国规模经济、促进结构优化、推进价值链攀升。

5. 确定合理的贸易保护水平，实行以贸易平衡为基本特征的国民经济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赶上发达国家，要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才能实现^[40]，从经济史看，这也是美国、德国培育内生比较优势，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崛起经验^①。第一，对部分新兴产品、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实施国产化和进口替代，给予生产补贴和关税保护。通过适度的贸易保护，建立创新企业补偿风险的保险等措施保护新兴产业的技术进步，扭转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和出口低端产品的贸易结构。第二，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逆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我国对外贸易应利用外汇扩大进口，改善自身贸易平衡度，满足人民升级的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 [1]王均伟,李建军.争锋:从大跃进、洋跃进到软着陆[M].北京:金城出版社,1998.
- [2]朱小丹.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J].中共党史研究,2013(10):33-34.
- [3]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J].百年潮,1998(1):4-11.
- [4]程万泉.走国际大循环的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思路[J].瞭望周刊,1987(48):28-29.
- [5]祝留.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讨论综述[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8(3):133-136.
- [6]国家计委副研究员王建提出设想 我国经济可走国际大循环发展道路[N].宁波日报,1987-11-30(3).
- [7]面对“国际大循环”山西怎么办?[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88(2):24-26.
- [8]罗福群.本刊举行《广东如何实现参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座谈会[J].南方经济,1988(2):42-51.
- [9]陈少斐.国际大循环纵横谈[J].广东金融,1988(6):11-12.
- [10]辛文.四川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基本途径和若干建议[J].财经科学,1988(4):1-6.
- [11]贾文广.缓解中国经济运行三个难点浅见[J].经济与管理研究,1988(2):14-16.
- [12]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13]蒋立东.对黑龙江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思考[J].学术交流,1988(4):68-70.
- [14]岳明甫,罗大军.参加两个大循环是振兴河南经济的必由之路[J].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88(4):38-40.
- [15]刘介勋,李泉.在国内、国际两个经济大循环中增强活力——浅议益阳经济发展战略[J].财经理论与实践,1988(3):35-34.
- [16]杨汝岱.“国际大循环”战略与四川经济[J].瞭望周刊,1988(12):16-17.

①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和德国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实行关税保护,夺取了英国工业和技术霸权的地位。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17] WTO: 2020 年全球商品贸易预计将下降 13% 至 32% [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541699535481157>, 2020-04-10.
- [18] 贸易保护主义将使世界损失 10 万亿美元 [EB/O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0-09-25/doc-iivhuipp6227368.shtml>, 2020-09-24.
- [19] Bekkers E, Schroeter 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 [J]. WTO Staff Working Papers, 2020.
- [20] 吴乐珺. 加强合作, 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性复苏 (国际视点) [N]. 人民日报, 2020-10-15 (13).
- [21] 我国 R&D 经费投入强度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 [EB/O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8-30/dociicezu-eu2122515.shtml>, 2019-08-30.
- [22] 富国强军的战略之举 [N]. 人民日报, 2017-09-25 (1).
- [23] 宁吉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 决战决胜实现目标必须加快补短板 [N]. 人民日报, 2020-07-24 (11).
- [24] 2020 年中国海外代购行业分析报告——行业深度调研与发展趋势预测 [R/OL]. <http://baogao.chinabaogao.com/daili/427739427739.html>, 2020-04-30.
- [2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0-05-15 (1).
- [26] 习近平.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07-22 (2).
- [27] 决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0-07-31 (1).
- [28] 习近平.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08-25 (2).
- [29] 习近平.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J]. 求是, 2020 (21).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31] 黄群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1): 1-7.
- [32] 李心萍. 用线上新型消费激活内需 (人民时评) [N]. 人民日报, 2020-04-21 (5).
- [33] 数据即“石油”新型生产要素写入文件释放重要信号 [EB/OL]. <http://it.people.com.cn/n1/2020/0411/c10093166-9856.html>, 2020-04-11.
- [34] 虚拟财产, 强化保护需有招 [N]. 人民日报, 2020-07-27 (6).
- [35]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 [D]. 2018: 45-46.
- [36] 杨虎涛. 数字经济的增长效能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 (3): 29-30.
- [37] 于长革. 经济增长与政府公共投资分析 [J]. 经济科学, 2004 (6): 103-111.
- [38] 贾根良, 等. 美国学派与美国 19 世纪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39] 路风, 余永定. “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6): 91-114.
- [40] See Chang H J.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e miracle, the crisis and the future [M]. Zed Books, 2006: 30.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ycl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rospect

ZHU Hua-xiong ZHOU Wen-lei YANG Tia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Economics School, Wuhan Hubei 430060)

Abstract: In 1978,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promot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87, China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great cycle” and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xport-oriented economy. By 2020, China will put forwar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domestic cycles play a dominant role and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promote each other and establish a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and form a strong domestic market. The guiding ideology, connotation concept and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two domestic and foreign “great circulation” strategi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analyzing, comparing and evaluating the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ternal evolution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uble cycle” theory, and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double cycle”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Double Cycle ;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 International Cycle ; Domestic Demand

[责任编辑: 李 蕾]

[责任校对: 周普元]